

冲击与博弈:文化研究视野下的经典教育

王伟

(福建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文化研究深刻改变了文学经典的生存状态。当前整个文化空间内的符号斗争尤为激烈,从根本上说,所谓文学经典的危机既是文学建制的文化资本被重新配置的反映,也是文学学科乃至人文学科整体边缘化的症候。尽管如此,经典决不会终结或完全瘫痪,共时结构的局部性延续依然会维持其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而且,经典仍然是文学教育的重要板块。只是人文经典教育特别需要处理好“共时”与“历时”或者“与”和“取”之间的关系问题,处理好原始作品与不断变换的背景之间永续的对话问题,从而避开“唯古是从”“唯一是听”的误区。

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学经典;文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 I0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13)01-02-0072-07

文学是共时文化结构中的重要一员:它生产符号,调配意义,以虚构的世界参与、介入、形塑甚至创造真实的世界。尽管在传播、传承的过程中经常骚动不安,然而,一旦穿越时空的羁绊,文学作品就能修成正果,从而跻身荣耀的经典序列。谈及经典,多数时候它意味着这是前贤留下的足以跨越时空的精华,是后人须要加以承传的基本文化素养,它显得沧桑、厚重而给人以庄严、肃穆感,它是文学性的完美典范,是文学史写作中屹立的标杆,是文学教育的主体或核心部分等。随着大众文化的兴盛与文化研究的崛起,所有这些坚固的常识印象都烟消云散了。总起来说,文化研究的客体毫无愧色地瓜分了经典的部分地盘,且有后来居上的生猛势头;而文化研究的方法则强悍地袭击了经典研究领域,之前经典引以为傲的资本被翻了个底儿朝天,隐藏其中的暗码被渐次公之于众,经典的神圣性严重受损。面对此情此境,深感快意酣畅者有之,疾呼抗衡流弊者亦有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结怨在所难免。

尽管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众多、取径多样、争辩不止、褒贬不一,但“致力于研究事物的来龙去脉”^[1]作为其突出特征应当没有异议。所有的文化都是意义的实践活动——生产、分配、消费与交换,文学经典自不例外,而一旦试图将文化置于其所处的脉络之中,意义究竟是如何生产出来、被哪些人利用、怎么利用、利用来干什么等问题就无以回避。这个时候,无论是社会权力,还是意识形态,都渐露峥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查理斯·巴克强调文化研究“探索意义地图的产制与灌输。它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语言游戏或论述行构,关切人类生活各种表意实践活动之中的权力议题。”^[2]换言之,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如何在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中生成兴趣盎然,它不再坚守经典具有某种神秘的自然性或不变本质,而是偏爱把经典历史化,考察经典跟其所处的共时社会结构中其他诸多因素之间存有怎样的复杂互动。只有深入领会了这一点,才能避免经典在从自然化走向历史化中出现的两种极端式误解:一是那种“客观主义”的立场,“相信分析到最后有一个基本的、连续的、铁一般的事实领域,作为所有经验知识的基础”。殊不知,任何事实或经验都决非中立,而是需要凭借语言的重新描述。伯恩斯坦一语中的:“试图确立一套单一的标准,当作区别何者为真正客观的,何者不

收稿日期:2013-01-10

作者简介:王伟(1977-),男,安徽砀山人,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

是的一个基础,这是笛卡尔以降之现代思想家一个最执着和最无益的偏见了”。待到遇见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这种坚信事物总有一个阿基米德式基点的想法很快就被击溃。二是那种自我否定的相对主义,它想当然地认为没有了不变的标准之后,经典将陷入无政府主义的万劫不复之地。其实,否弃了“客观主义”并非意味着丢弃“客观性”。因为任何领域都有“主体间的理性标准或探究规范,借此我们试图将个人偏见、迷信、错误信念与客观主张加以区别”。^[3]从自然化走向历史化,也即是从稳固到流动,由封闭而敞开。如此一来,我们就不会再把来自人类之外的什么东西奉若神明,当作裁判何谓经典的不二法门,而是转过身来关注熙来攘往的历史细节。“历史未定。生命幸甚,并无剧本;临场的即兴创发,永远可能;没有什么使未来必然实现形而上学家拟定的节目。”^[4]换言之,文学经典、人类文化、人类自身都没有什么既定的演出底本,都是在根据各种给定的条件进行现场创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有意或无意地扭曲或物化本应动态化的经典。

历史化是文化研究去经典化的锐利武器。譬如,研究者指出,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的勃兴与1880~1910年间的欧洲移民大潮同时发生,这是值得深思的历史插曲。当然,它并非纯属巧合,而是与文化融合问题关涉极深:在统治者的构想中,英国文学担当着团结来自不同种族、文化的庞杂人口这一重任,使他们在统一的文化之下迅速美国化。而美国文学课程的开设则与战争宣传的需要直接挂钩,它意在抵制德国与苏联对美国的不利影响。尽管它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独特的学术领域,但一直到1950年代,它在美国英文系中也没什么地位。而那些认为美国文学传统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点是“意识形态的神化”,是“许多自称‘文学性的’文本或由凌驾于文本之上的批评杜撰出来的”。^[5]去经典化的同等重要的路径是“去中心化”,^[6]它猛烈攻击文化及文学经典中的男性中心、欧洲中心、精英中心等主导倾向。于是,传统文化、官方文化都成了解构的磨刀石,不应误解的是,去经典化不是一概否定经典,而是在新标准下剖析经典存在的暗伤,从而尽可能地扩大经典的范围与包容性。譬如,米利特颇具开创性的著作《性政治》激烈抨击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作品中的男权中心思想:女性在其中没有主体性,不过是男性在争取自主的抗争过程中的牺牲品罢了。这就启示男男女女注意女性的被表述地位、女性作家在经典系列中的缺席,从而考量、添加女性在经典中的分量。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则揭开了后殖民批评的大幕,人们开始意识到貌似公正的西方知识如何把东方他者化,如何在异域风情的抒写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高高在上的殖民优越感。而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则以谱系学的方式鲜活地展示出文化概念的变迁,启发人们不能把文化拘囿于上层精英的所谓无功利式的美学成果,而应打破这种偏见,视文化为整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性别、民族、阶级等维度的突显必然会影响到经典载体——文学史——的形态,因此,重写文学史堪称开放经典、重述经典的一种方式,而这些维度不论与宏观政治还是微观政治,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因此,重写历史本身也是政治思想、政治观念的隐晦表达。

需要说明的是,开放经典的确敞开了经典的大门,但这绝不是说一朝登上经典的榜单便可以永享经典的荣耀,否则,历时的经典堆积至今当真是汗牛充栋了。必须承认,有些经典更多地被同时代的人们所熟悉、热衷而走不出共时的结构,或者即使能走出也走不太远,而有些经典则可以穿越漫漫长夜,继续在新的共时结构中不懈地释放能量。对研究者来说,需要做的并非挖掘穿越背后是否有什么经久不衰的文学性,而是探讨经典在旧的共时结构中如何成形,经过哪些通道而融入下一个新的共时结构,在新的结构中又获得了怎样的新形象,那些曾经的经典何以被新的结构所抛弃,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某些经典最为耀眼的品质何以在新的结构中遭逢明迎暗拒、改头换面以至刀砍斧削,那些曾经被说得一文不值或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何以最终竟然也名正言顺地进入了高等学府的文学史课程,等等。同理,文学史写作就不是简单地历时式作品罗列,这样记流水账、东拼西凑、相互雷同的文学史教材纷至沓来,如果作为入门的启蒙读物并无不妥,只是应该在此基础上有所提升,更多地探究一些不那么简单的问题。譬如,共时结构何时发生了更迭?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转换的过程究竟带来了哪些范式性的重大变化?转换如何重塑了文学经典?如此等等。返回共时的结构,再也没有什么暗中操控的神灵或魔法,于是,光芒四射的经典被“去魅”。所谓“去魅”即是祛除神

秘化与神圣化的蛊惑,力求从渺茫的星空回到风尘仆仆的大地,这也是现代性区别于前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经典不再是天生的贵种,而是需要凭借自身的素质与潜力接受历史的选择,在大众传媒如日中天的当下,不能否认会有一些作品经过包装与吹捧而爆得大名,但时间的淘洗总会令其露出马脚,理性的选择终会让其掩面而去。虽然经典是风云际会的产物,它仍应得到人们的尊重,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落到这般田地:有短视的“批评家”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再不想读什么《红楼梦》之类的经典作品,因为它们甚至比不上灾难时期普通男女的一条手机短信那样动人——“止增笑耳”。

文化研究的去经典化让哈罗德·布鲁姆大动肝火,他斥其为“憎恨学派”——包括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符号学派这六个支脉。针对这些泛滥的“时代流弊”,布鲁姆单枪匹马英勇出战,他以审美价值为中心、以崇高为标尺重建经典的历史,是为《西方正典》。因为在他看来,文化研究敌视、糟蹋了审美价值,培养出的全是一些并不真正热爱阅读的体制性憎恨者,再也没有丝毫的浪漫情怀。他需要站出来,以实际行动指导学生阅读哪些经典、如何阅读经典。那么,在布鲁姆眼里,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呢?“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7]412}“一部经典就是一份已经获得的焦虑”。^{[7]416}换言之,经典纯粹是作家自己的事儿,跟“文学性”以外的东西都扯不上。作家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妥善处理前代作家留下的“影响的焦虑”,这要求他们必须在美学价值与性别、种族、阶级的多重决定之间做出明智的抉择。显然,本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它们现在被硬性切割为剑拔弩张的两方,“文学性”的焦虑定义了文学,并毫无疑问地成为推动经典诞生的元动力。而这与布鲁姆对“审美”的认识也珠联璧合:审美只是个人的关切,与社会无关,文学批评总是并仍将是一种精英现象。布鲁姆们对审美、文学性、文学经典的捍卫实际上展示了一种哀伤的守望姿态,它一方面应该引起文化研究阵营的反思,另一方面却也把自己囚禁于荒凉的孤岛。

二

从“诗言志”到“兴观群怨”,从“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的“诗教”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程中代代相传。“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尽管传承下来的经典被以白话为标杆重新挑选、排列,但这并未根本改变文学本身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方位——所不同者,先前的“诗教”变成了思想启蒙,而且,随着近代高等教育的兴起,“文学”被明确地立为一门学科,与政治、商学、地理、算学、格致、农矿、工程、兵学、卫生学等科共同担负起援引西方文明与近代科学文化的重担。晚近跌宕起伏的历史显示,文学在众多学科中脱颖而出,神情严肃地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还比较有耐心先通过文艺为整个文化换血、改变芸芸众生的思想,从而为迈向西方式的政治乌托邦奠定基础的话,那么,随后的时局变迁与思想引进似乎就不再这样优游婉顺:追求立竿见影之效的文艺被直接等同于革命的留声机,成了革命的吹鼓手。在“革命文学”渐趋激进的过程中,余温尚存的白话经典迅速成了批判的标靶,而自我经典化的红色文艺作品则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力争赢得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这一最高荣誉与最高奖赏。当极左政治最终崩塌时,早已狭隘不堪、疲惫不堪的文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作家正大光明地拥抱人、人情、人性等创作题材与主题。有些反讽的是,长期致力于“去政治化”的文艺此刻实际上汇入了新的“拨乱反正”的政治潮流,文学仍然在政治的光照下引人瞩目。到了 1990 年代,商业勃兴并很快与文艺一拍即合、联袂而行,商品化的文艺沾染了愈来愈多的“铜臭味”,再也无法重演过去那种登高一呼、天下影从的场景。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一位著名作家如是说。也正是在此时,文学建制曾经拥有的文化资本面临着被重新配置的尴尬境地,所谓文学经典乃至人文学科等的危机都应该追溯到这里才可以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

文学经典的危机是为了文化资本而在文学场域的内部与外部展开争夺的结果。尽管文学场域内部的斗争看似相对独立,但它总是或隐或显、或间接或直接地受到外部的制约。因此,无论是体裁本身的位置变化,

还是体裁内部的等级升沉,都是内部与外部相互联手的产物。毕竟,“外部变化为各种新的生产者……及其产品提供了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在社会空间中占据了与他们在场中相似的位置,因此拥有配置和按照供给他们的产品来调整的趣味”。^[8]也即是说,这种符号的斗争往往同时也是不同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之间综合实力的斗争,文学史为此提供了生动的写照。以中国文学史为例,大体来说,在前现代时期,虽然经典文学与世俗文学之间的互动偶有发生——或者是雅文学收编了俗文学,或者是当雅文学缺少活力时倡扬“真诗乃在民间”,将其作为调整自我的一种手段,然而,俗文学的力量从来没有强大到足以抗衡雅文学的地步。即便是现今占据文艺界主导地位的小说,它洗去“小道”这个耻辱烙印的时间也不过百年之久。如果不是梁启超把“小说”与“群治”链接起来,恐怕小说不会那么快就被贴上“最上乘”文学的标签。但不应忽视小说繁盛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缘:现代传媒(报刊与杂志)的兴起、教育的普及、白话在文艺中的风行、专职作家的涌现、商业气氛的增强、消遣游戏的抬头等等。这些都为消费意义上大众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经历过“鸳鸯蝴蝶派”等的昙花一现之后,伴着1990年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学波澜再起,那些陈年往事虽然还在课堂上正襟危坐,但经典的生存空间已经被严重冲击,因为男男女女有了更多的阅读选择。随着万维网的迅猛发展,网络文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作家的称号也不再如以往那样高不可攀,一台电脑、一根网线、轻敲键盘让无数人体验了并正在体验着作为文学生产者的欣快感。

迄今为止,类似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之间关于大众文化的争论远未尘埃落定,但无可否认的是,它给文学经典带来的冲击更为剧烈。大众文化坚硬的存在再也不容小觑,尤其是图像时代的来临吸引了愈来愈多的眼球。一部文学作品的面世不见得会有多少人关注,而一旦被传媒纳入大众文化的版图就全然不同,如果有幸搭乘影像的快车,那就会红遍大江南北,原作的知名度可能也在改编后芝麻开花节节高。对那些老掉牙的经典来说,同样如此。试问,没有央视“百家讲坛”的热播,《论语》等传世经典的热销又从何而来?因此,以下这个现象并不出人意料:新的小说不断出版,但举步维艰的(实体)书店更倾向于倚重已经名声在外的作家、特别是与影像相关的书,以及那些由其出版商开展的市场营销所支持的书。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作家难以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而一门心思去钻研如何获取影像的垂青,结果只能是文学的园地充斥着不计其数的大路货,平庸而低俗。影像有浓烈的明星效应,观众在观影体验中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而且,影像与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也颇为微妙。不应简单地把影像视为对现实的反映或记录,而应意识到它“通过文化中的符码、惯例、神话及意识形态,并通过媒体特定的表意实践,对现实的图像进行建构和‘再现’”。^[9]换句话说,影像牵涉的是一项复杂的意义生产活动。毫无疑问,在意义调配的过程中,选择或舍弃、凸显或压抑哪些部分大有学问。

当今时代,文化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文学在其中所能占到的份额却相形见绌。大卫·钱尼指出日益重要的文化包含三个方面:其一,“娱乐工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所具有的经济意义”。其实,哪怕普通人对此也能略知一二,譬如,前段时间火爆的76集电视连续剧《甄嬛传》制作方一集的收益竟达400万元,这还是媒体的保守估计。或许,《功夫熊猫》首映全球票房超过1.5亿的神话人们仍会记忆犹新,因为还有更多的好莱坞后继者紧跟其后。其二,“更普遍的经济活动已经由物质工艺品贸易转向符号工艺品贸易这一流动方式”。也即是说,侧重物质加工的工业生产被侧重文化创意的符号生产所超越,它以创造力为核心,强调依靠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来开发、营销知识产权。于是,与经常具有审美性质的设计成分相比,物质生产过程中具体的劳动过程对价值的增长甘拜下风。另一方面,作为文本生产商,文化产业制造并发行意在提供信息、娱乐的文本和作品。其三,文化成为商品关系的焦点,被当作“公共政策的议题”与“促成公共政策实现的手段”,被“用作经济复兴和社区发展的手段”。^[10]创意产业受到世界各国及地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付诸行动,常常被当作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重新配置城市空间、提升国际地位等的秘密武器。正因如此,甚至有研究者继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之后大声疾呼:世界文化大战已经打响。在对30多个国家1250位创意产业领域中的领军人物历时五年的实地采访后,马特尔得出结论:“这是一场各个国家通过传媒进行的旨在谋取信息

控制权的战争;在电视领域,为谋取音像、电视连续剧和脱口秀节目‘形式’的支配地位而战;在文化领域,为占领电影、音乐和图书的新市场而战;最终,这还是一场通过互联网而展开的全球内容贸易的战争。”^[11]不言而喻,如同在“硬实力”领域的竞争一样,这场“软实力”领域的争夺战也同样呈现出极端不平衡的面貌,控制与反控制、主导者与后起之秀间的拉锯战永不消歇。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经济话语、金融话语如日中天的年代里,文学话语只能叨陪末座。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中,文学话语惟有强颜欢笑。处身由政治话语、军事话语、体育话语、新闻话语乃至美容话语、养生话语等等组成的话语光谱中,文化话语也无法掩饰住那份难言的落寞。除了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等各种大规模的文学颁奖之外,社会大众对这种文艺圈儿里的游戏并不怎么上心。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微博上的某句话或某条信息——谈论的内容五花八门——却可以瞬间传开,引人围观。这是不是说明相比之下,文学话语参与时代的能力出了问题?如果大量的文艺作品对于最广大的群众所极为关切的社会问题始终不闻不问,头脑昏昏地步娱乐之后尘;或沉溺于后宫佳丽的争风吃醋,或痴迷于俊男靓女的风花雪月,或执着于歪曲历史、拔高自我、矮化他人,如此等等,那么,打着审美幌子的文学作品看着洋洋洒洒,而给人的启示可能真的就不如网络社区内一个简短的跟帖,其令人唾弃的结局自然也理所应当。真正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作家沉下心来,学习经典介入时代重大问题的勇气与精神,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以艺术的形式给出自己的判断。当然,这是限于主体间领域的描述、解释、评价或反思,它的信誉建立在共同体所共享的文化基础之上。毋庸讳言的是,面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信誉的影响因子呈加速度下降趋势,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人文教育的潜力明显衰微。如何认识这种人文学科的危机?如希贝尔克所言,我们应意识到充分理解世界的复杂性远非人文学科自身能够胜任,需要“承认自己的历史限度”,同时认识到自己在“功能上不可或缺”,而必须“依赖于把我们和大量学科联系起来的传递洞见的复杂之链”,从而“不停地和其他建制相互作用”,“调解视角的主体间的结构”。^[12]换言之,人文学科只有在与共时结构中的其他学科的相互区分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在积极的参与中才能不断地自我调适、重构自我。

三

经典的建构可以归结为文化资本的形成及分配问题,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资本”——“人们借此获得一种社会认可并看重的话语方式”,二是“符号资本”——“人们掌握这种知识资本以后就将按需所用,这使掌握者有权获得对良好教育背景所给予的文化与物质奖励”。^[13]既然如此,经典的衰落就可以说是它所代表的语言资本与符号资本的相对萎缩或重新调配,结果只能是它在整个文化结构中所占比例的调节,而不可能是如有人担心的那样完全瘫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激烈反传统,宣扬不读古书,甚至要废除汉字,然而,如果浏览一下他们的文艺作品,就容易看到其字里行间依然留有经典的痕迹。因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不可能完全弃置文言文而不顾,更不可能将文言文所携带的文化底蕴、审美趣味全部根除。而且,就是在大力引入外来语汇的同时,也不能不借助传统语汇并赋予其新的内涵。近代中外交流史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一般认为借自日语的很多词汇其实都是中国古语,譬如“文法”“权利”“民主”“历史”“作用”等,“这些词汇就好像那些长期侨居外国的人,一旦白首还乡,常被误作外国人一样”,而它们早在中国古典中频繁出入。^[14]尽管“五四”常被认为与传统“断裂”了,但那种藕断丝连的纠葛并未消除,从语言到整个文化,莫不如此。从根本上说,某种程度上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得益于共时结构的局部性延续:时代的变迁不断打破旧的社会结构,“五四”即是如此,而结构破裂后意味着新旧因素的重组,那些被纳入新社会结构中的旧有关系项就保证了经典或顺利或曲折地被接纳。只有深入理解这一点,人们才会坦然地面对经典文学与文化,而不是杞人忧天式地焦虑经典的沉沦,进而大张旗鼓地开展儿童“读经”运动。荒唐的闹剧一再上演,我们的确要继续继承经典的传统文化,问题是,一定要以身着古装的方式吗?要不要继续探讨经典在共时结构中的作用,

看看传统文化与当下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而非不切实际地复古或食古不化。

经典何以能够代代相传？除了语言、共时文化结构的接续之外，教育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代中国十分重视“乐教”，《尚书·尧典》中就有用诗乐歌舞教导贵族子弟的记载，《论语》中也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类似说法。而事实上，儒家有一套完整的经典教育构想，《荀子·儒效》认为“《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尽蕴其中，因而它们是教育的核心、学习的典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套构想大都付诸实践并在漫长的帝王时代占据主导地位。“教育中涉及的理论、政策和实践不是技术性问题，它们本质上是伦理性和政治性问题”。^[15]换言之，不论我们乐意与否，教育与课程中都渗透着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权力游戏，教育远非什么自然而然之事，而是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暧昧。那么，哪些作品能够成为经典、又选择哪些经典作为必修课程等，就都与意识形态脱不了干系。接受经典教育作为晋身之途，儒家的这种做法在科举制废除后也随之被搁置，它转而变成国民素质的组成部分。回到人文素养这个层面，经典教育的合法性得到强力支持：人类与动物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能够累积、发扬、光大自己的文化，以此来逐步改进生活的环境，使愈来愈多的男男女女可以过上更为富足、惬意的日常生活。如果割断或舍弃了文化，岂非是要倒退回原始的野蛮状态？在经济日益高速发展、社会财富以加速度增长的当下，没有文化的规约更形可怕，绝大多数的财富被一小部分人以并不正当的方式在暗中轻松敛去，而芸芸众生一方面被“幸福”话语的光芒所笼罩，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无奈接受“屌丝”的实际处境。此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训不知流落何方？如何真正实现？先民们与那些被我们斥为腐朽的资产阶级阵营又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典文献？何以一拖再拖而迟迟无法进入讨论的日程？经典之所以成其为经典绝非凭借它的完美无缺，相反，或是因为它回应了时代的重大问题，或是由于它触及了人类最为根本的情感，或是因为它带给世人以新的视界、经验与洞见，如此等。譬如《动物庄园》《一九八四》《关雎》《静夜思》《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等。无论属于哪一类，文学经典都值得认真学习、研讨，都应成为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板块。反过来看，文学教育也是经典化的重要渠道，它通过教育体制为作品保驾护航，通过文艺理论、批评阐释助其跻身经典序列。毋庸讳言，这里面少不了一些滥竽充数的家伙。

人文经典教育特别需要处理好“共时”与“历时”或者“与”和“取”之间的关系问题，处理好原始作品与不断变换的背景之间永续的对话问题，从而避开“唯古是从”“唯一是听”的误区。具体说来，面对原始的作品，经典教育首要的任务是让受教育者知晓今天的我们如何诠释某个经典文本，在现今的文化结构中又居于怎样的位置。然后，是告知他们经典的接受与阐释有何变迁，这种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已有的诸多解释对我们的理解有何影响等。最后，它在共时结构中被如何接受，或者说，它在共时文化结构的建造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当然，经典解释的这几个不同的层面应该分别针对不同的受教育者量身而行、把握好侧重点，不能不顾实际情况地要求整齐划一。相比之下，这三个层次需要的知识储备呈递增状态，也不妨说它们是普通受众与不同深度的专业研究者之间的差别。譬如，《诗经》的开篇《关雎》，一般读者只需知道它是一首爱情民歌即可，而研究者则需要懂得对其阐释的重要流变、促使变化的因素，更进一步的探究需要考察《毛诗序》中“后妃之德”的权威断言如何建构了共时的汉代文化，如何具体发挥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的功用，后世对这种“诗教”传统又有怎样的认可、抵抗与调整。容易看出，这第三个层次是最见功力的，因为面对文学经典尤其是古代的经典，我们决不能望文生义、信口雌黄，而是需要回到特定的共时结构、回到共时的文化语境来进行理解，否则，必然会闹出笑话来。对此，某位深谙传媒之道的女士就曾当着亿万观众的面给出了无比生动的例证。譬如，她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中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子”，面对公众的质疑还大言不惭地辩解说是自己的“心得”，而置《论语》中的其它大量有力旁证于不顾，譬如“君子坦荡荡，小人休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论语》中“君子”与“小人”的对举不单流传至今，而且深入民间，类似这样明显的连中学生也不会犯的错误还有很多，经由央视的广泛传播，结果只能是以讹传讹。

长期以来,经典教育中的标准答案情结愈演愈烈:从标点符号、一个用词、一个句子着手,苦心孤诣地从中寻找微言大义,挖空心思地赞叹经典的精妙之处,热衷于把某个解释定于一尊并贯彻于考试制度中。如此一来,经典就由开放的作品而成为封闭的作品,经典可能蕴含的多义性与不同时代、文化语境引发的新阐释就要么被遮蔽、要么不具有合法性。它们虽然不一定会完全颠覆原有的解释,但往往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譬如,与对《西游记》教科书式的理解不同,网络上广泛传播着如下解释:没有背景的妖精都被打死了,而有背景的全都被主人救走了。这个说法颇具现实色彩,有所所指,但可以自圆其说。“就像一幅精心制成的织锦,文本包含着复杂的模式与意象。仅从某一方面来看,文本就只呈现其纹理的某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如果变换视角,就可以观察到文本的复合纹理,譬如内在纹理、间性纹理、社会与文化纹理、意识形态纹理、神性纹理等。^[16]人们不可能将其一次性地尽收眼底,许多时候,其中的某一方面常常会借助新的历史语境而惹人注目,从而使经典旧貌换新颜,所以,我们不能抓住某种意见不放,不愿意听取其它的声音,总是以唯一正确的真理自居而将喧哗的众声拒之门外。充其量,这只算得上是一副捍卫经典的教条主义者形象,而不是启发人们经典魅力所在的引导者、宽容者形象。一般情况下,前者代表正统,很难接受经典的变异、破碎、分解、嫁接与重生,如时下非常流行的重写、改写、戏仿、恶搞甚至亵渎经典等,它们都是经典的衍生品。譬如,《李逵日记》《沙僧日记》《静夜思·偷情》《杜甫很忙》等。某种程度上说,一部作品面世后无论是受到赞誉还是贬低,都是幸事,遭遇无人问津才是它最大的悲哀。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对经典看似大不敬的援用未尝不是经典得以延续的一个明证,当然,它选取的形式是“非主流”的。古人云,“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作为负责的研究者,不应简单化地给其戴帽子或全盘否定,而是需要探讨披着经典外壳的它们究竟表达了怎样的一种情绪,彰显了怎样的社会思潮,或者凸显了怎样的青年亚文化等问题。因此,要以一颗平常心最大限度地包容它们,视其为经典接受过程中再正常不过的变化,同时尽可能让更多人有机会窥见之前共时文化结构中经典的容颜。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唯有如此,经典才不会仅是后人阅读生活中的死句,而是(从理论上说)可以无限汲取的充满生机的源头活水。

参考文献:

- [1][澳]马克·吉布森.文化与权力:文化研究史[M].王加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 [2][澳]Chris Barker.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M].罗世宏,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42.
- [3][美]理查德·J.伯恩斯坦.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M].黄瑞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46.
- [4][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M].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20.
- [5][美]伯科维奇.剑桥美国文学史:第8卷[M].杨仁敬,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264-268.
- [6][美]本·阿格.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M].张喜华,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3.
- [7][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412,416.
- [8][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01.
- [9][澳]格雷姆·特纳.电影作为社会实践[M].高红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77.
- [10][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M].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46-47.
- [11][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M].刘成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66.
- [12][挪]G·希尔贝克.时代之思[M].童世骏,郁振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52.
- [13][美]约翰·杰洛瑞.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M].江宁康,高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 [14][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74.
- [15][美]迈克尔·W·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
- [16][美]罗宾斯.探索文本的纹理[M].霍成举,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下转第 88 页)

- [15][英]特里·伊格尔顿. 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 马海良,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96-97.
- [16]南帆. 冲突的文学[M].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0: 12.
- [17][斯]斯拉沃·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季广茂,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61-62.
- [18][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M]. 王逢振,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6.

Anti-Teleology: Althusser's Causality of Unbalanced Structure

BIAN Youj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arguments on Louis Althusser's epistemology,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arxist dialectics and Hegelian dialectics. Louis Althusser, by returning to Marx and his writings, states the basic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Marxist dialectics and Hegelian dialectics and thus forms a new epistemology in his mind. The difference of this new epistemology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which is based on Hegelian philosophy, lies in the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ognitive object and the object in reality in the course of cognition.

Key words: Althusser; anti-teleology; causality of unbalanced structure

(责任编辑: 江 雯)

(上接第 78 页)

Shock and Game: Classical Education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WANG Wei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studies have profoundly changed the survival state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symbol struggle within the cultural space is fierce. Fundamentally speaking,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is a reflexion of the reconfigur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of literary institutions, and the syndrome of marginalization of literature as well as humanities as a whole. Nevertheless, the classics will never draw to a close or end up in paralysis since the extension of age structure will remain to some extent its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Classical literature still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literary education i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of "giving" and "taking" should be handled properly, and the "model answer" complex be dropped.

Key words: cultural studies; literary canon; literary education

(责任编辑: 江 雯)